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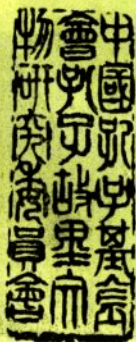


孔子故里史迹考略

孔德懋題



《曲阜報》增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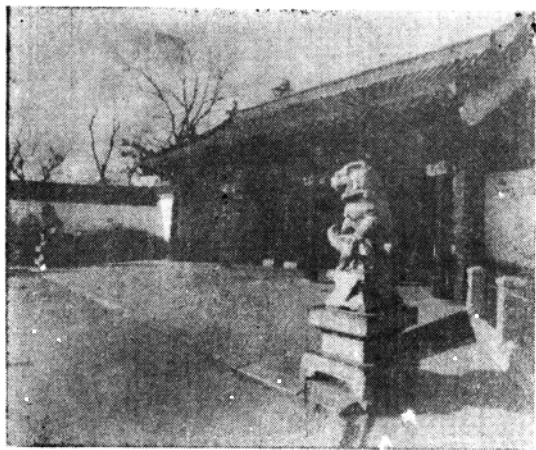
孔子故宅井
(前二栏杆为响石)



汉石人



尼山孔庙观川亭



孔府大门



孔府门神

前言：孔子故里史迹与孔子研究

中国孔子基金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它的任务是团结海内外学术界的朋友，共同研究并发扬继承孔子、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的文明及社会进步做贡献。

孔子故里文物研究委员会是孔子基金会有一个下属组织。它在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领导下，团结组织对孔子故里文物古迹关心和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专业工作者，对孔子故里一带的文物古迹进一步调查和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研究和探讨，从而使孔子、儒家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深入开展。《孔子故里史迹考略》便是实现这一意图的一个初步尝试。

布衣孔子生前虽不得志，但死后其学说却为历代统治者竞相利用，其地位日益提高，且经久不衰。历代为了对孔子尊崇和利用，多在其家乡对其生前活动过的地方加以修饰建造，成为一处处与孔子有关的史迹。再加上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地上地下文物瑰宝蕴藏丰富，这些古迹与文物是进行孔子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其作用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说起：

一、利用孔子故里的史迹研究孔子生长的环境和条件：

孔子，这位博学而又享有盛名的人物，为什么生长在鲁国，而不生长在别处？人们就要研究这块生长哲人的土壤——鲁国的历史、地理及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位于泰山之阳、沂蒙山以西、华北大平原东南部的鲁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以来生产就比较发达。据今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

就产生在附近不远的地方，被称为我国古代东夷人的东方部族少昊，也曾在这一带活动。曲阜还有传说中黄帝的诞生地寿邱，后世人在曲阜城东建造的少昊陵及陵内的云阳山，就象征着远古少昊族活动的基地，商王盘庚由奄迁到殷墟，曲阜即古奄故地，地下蕴藏丰富的古鲁城就是当年鲁国的故址。1977年至197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辛勤的劳动，已把古鲁城全部钻探完毕，绘出当年城区的示意图，向人们展示出这个周长23.54华里，面积约34平方华里的古城的基本面貌。古城内的各种建筑和交通网络，将城池、宫殿、作坊、居民区连为一体，布局合理。大量古迹证明周时的古鲁城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建筑水平。人们从这一繁华的古都中看到西周初年周王对鲁公的特别赏赐。

周公旦在西周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中功业最大，故国王赏赐给他的冠服、礼器比于天子，因此当时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都达到堪与周王国比美的地步。直至几百年后，韩宣子聘鲁，见《易象》及《春秋》后说：“周礼尽在鲁矣。”吴公子季札遍历北方的卫、郑、徐等国，与各国士大夫作一般交游时。惟独到了鲁国，“请观于周乐”，观后赞叹不绝，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在古鲁城试掘中发现了一些精美的工艺品，如西周墓出土的“鲁仲齐宝鼎”、“鲁中齐旅甗”等等青铜器，古朴完整，铭文清晰。东周墓出土的成批大型玉璧、镏金长臂猿带钩、鲁国铜币、螭形玉佩、战国瓷器等，均系珍品，成为研究古鲁国历史及孔子生长条件的有力证明。

鲁国最早实行“初税亩”，较早使用牛耕，手工业也很发达，这不但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曲阜东关外的鲁班庙，也体现出当地人对古鲁国能工巧匠的歌颂与纪念。还有今城外东北方，位于古鲁城中心的周公庙，是当年鲁国太庙的旧址。庙内元

圣殿中雕塑周公、伯禽及金人像，还有一些赞颂周公的碑刻、画像石，都反映出周公当年“制礼作乐”，厘定周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功业。孔子一生恪遵周礼、崇拜周公，他曾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正有实物证明。庙内东院的问礼堂故址至今尚有清乾隆亲题儿首诗碑，《论语》中两处记孔子“入太庙，每事问”，问礼故址便在此处。“太庙问礼”一事，体现出青年孔丘好学的精神，也说明当时鲁国礼制完备，文化发达，成为孔子诞生于此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利用孔子故里史迹研究孔子的生平事迹：

司马迁为写信史，跋涉数千里，四处访问考察时，曾“登鲁，观仲尼庙堂”，搜集了许多自己亲眼观察和亲耳听取的事实，故《史记·孔子世家》便写得比较具体。文章开头记“孔子生鲁昌平乡鄹邑”，孔母“祷于尼山生孔子。”文中所记古代地名，至今犹存。今曲阜城东南有昌平山，山下即古昌平乡址。孔子生地尼山在今曲阜城东南25公里。这里山明水秀，林壑幽美，在五峰中涌出的中峰尼山，脚下东侧的坤灵洞（夫子洞）传为孔子诞生之地均完整保存。北周显德年间，兖州令赵某以此处为孔子发祥之地，始建孔庙。宋仁宗、元顺帝及明成祖时又大行修建，成为五进院落，五十多间殿堂的尼山孔庙。庙内除为孔子及其父母特设的殿堂外，还有专门为祭祀“储丕佑于商后，孕金气于孔族。挺毓睿哲，为万世师”，即因生孔子有功而被封为毓圣侯的尼山神等。

孔子生三岁，父叔梁纥死，“葬于防山”，其母死后，孔子又在纥父之母的帮助下，“合葬于防”。防山脚下，今曲阜城东15公里的梁公林，即其父母合葬之处。林内有享殿、石仪及被宋、元皇帝相继封为齐国公、启圣王的叔梁纥夫妇合葬墓及孔子之兄孟皮的墓。

孔父死后，孔母带着三岁的孔丘由鄒邑迁居阙里。今阙里街北端的“孔子故宅”，传即孔子当年迁居以后常年居住的地方。在其周围虽有历代帝王下令修建巍峨堂皇的孔庙，但孔子故宅内仍存当年孔子饮水用井及教子学诗学礼的诗礼堂。故井虽被修饰，诗礼堂虽经扩建，但人们至此仍可具体地体会到孔子当年“疏食饮水”以明志，“学诗学礼”以教子的情景。

后世为了尊崇孔子，用各种形式对其宣传、表彰、历代绘制的孔子像、一再向人们展现出后人心目中的孔子形态。孔庙内保存着许多描绘孔子形象的刻石。如传为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绘的《孔子为鲁司寇像》，长须的孔子着高冠朝服，面目端肃，再现出孔子当年为鲁司寇的威仪。相传唐时画圣吴道子绘的《孔子行教像》中的孔子侧身站立，宽衣博带，左侧佩剑，皓首满须，慈祥瑞庄。又传顾恺之绘实为北宋绍圣年间的《颜子从行小影》中绘孔子及其得意弟子颜回的形象，体现出以好学著称的颜子对老师亦步亦趋的特点。《孔子凭几像》绘出孔子及其十大弟子的群象，尤其嵌于孔庙圣迹殿内的一百多幅《圣迹图》，更以许多形象生动具体地再现出孔子的一生。人们通过这些具体的形象对孔子一生事迹得以全面的了解。

孔子生于鲁国，大部分时间活动于鲁国，死后又葬于鲁国，《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葬鲁城北泗上”，还记其弟子守墓三年，子贡守墓六年以及孔子葬后，“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冢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曲阜孔林中的实物正是这些记载最好的注脚。

孔林是孔子及其子孙长眠的地方，也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地。当年孔子弟子及鲁人在其墓旁守墓形成的孔里，多次扩展，到明初增为三千市亩，历代增修达十三次。林内有依古制马鬣形筑成的孔子墓，及其子孔鲤、孙孔伋墓和传说中的

“子贡庐墓处”和“子贡手植楷”等。孔子生前只是一位普通的文化人，其墓葬不会太豪华。但其墓前矗立“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墓碑，却标志出他崇高的头衔。用泰山封禅石垒成的石案，足证历代帝王把他比作江山社稷一样的重要。后世对孔子的景仰也从一个侧面对孔子的一生做了恰当的总结。

三、利用孔子故里史迹研究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主要记载于各种古籍中，但从其家乡的古迹文物中也可窥出一二。古鲁国太庙（今周公庙）殿堂廊庑的安排，符合周礼的建筑规格，高大的古鲁城可以看出当时周天子封给鲁公比于王制的特权。站到曲阜城外西北的斗鸡台上，便会想到当年鲁国季孙氏与郈氏斗鸡，以及鲁昭公被季氏赶走，“礼坏乐崩”的情景，孔庙内的各种古代祭器、乐器均依古制，连后世乐舞生演奏的大成乐和八佾舞，也是按照古代的程式排练而成。为纪念孔子教子学诗学礼而建的诗礼堂及后世为林放问礼而立的“问礼故址碑”等都是孔子当时强调“礼”的表现。曲阜一带地下发掘古墓葬中依周礼规格的葬式，亦为孔子维护周礼之所本。

不少论者多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在许多地方强调修德、行仁，从曲阜当地某些实物中亦可窥出端倪。如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曲阜周围发掘的许多西周、春秋墓葬中，死者身旁多有人殉，唯独曲阜的墓葬中，死者身旁只有随葬品。身下有时殉狗，却无殉人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与鲁国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看的话，那便是当时劳动创造者的财富较多，劳动者越来越被统治者重视，奴隶主热衷于役使奴隶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愿把他们拿来殉葬，让其白白死掉。这与孔子仁的思想又不能说没有关系。

孔子当年集鲁国的档案编成《春秋》一书，其目的是依照

西周的等级名份将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记载下来，他依周礼为准绳对合理与不合理的事“笔者笔，削者削。”我国这部最早的编年史，对后世的史学与政治均有不少影响。后世封建统治者极力表彰此事，提倡学习孔子依礼行事的行为。在今城东南5公里的息鄫村设了春秋书院，立了“孔子作春秋处”碑。《论语》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主张，具有一些哲理。曲阜一带传有两个观川处：一说孔子偕同弟子出了鲁城南行不远，在沂水岸边观川叹水，一说在尼山坤灵洞上方观川而慨叹。尼山现存一座观川亭，位于山上孔庙东南角的高处。登临亭上，东望蓼河，流水潺潺，慨叹逝川，隐寓哲意，对人颇多启发。

孔子在鲁国办过多年的教育，以六艺教授生徒，其故乡也不乏遗迹。《论语·宪问》“阙党童子将命”句记孔子依礼对阙党童子评论的故事，体现出他看问题的深度。顾炎武考证阙党即曲阜城内的阙里。《论语·述而》“互乡难与言”句记载孔子看到互乡童子的进步，非一成不变地看待别人。《曲阜县志》记，曲阜城北姚村传即古时的互乡。《礼记·射义》记，孔子教弟子“射于矍相圃”，今城内孔庙西南便是当年“孔子射所”。孔子博学成名，许多人不远千百里就学归德，古鲁国西南门即名归德门，明修曲阜城亦名归德门，门外有“归德桥”。至于其弟子颜回贫居陋巷的陋巷故址，其弟子子路“宿于石门”之石门，以及孔子带学生“浴乎沂，风乎舞雩”的舞雩台等古址迄今仍在。有的虽经改建，但人们至此联想起孔子当年的教育活动时，仍会油然而生敬意。

四、利用孔子故里史迹研究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孔子及儒家的尊崇和利用，从而看出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一直居于“圣人”的地位。历代帝王为了利用孔子思想进行统治，采取许多办法对其尊崇：一是对孔子屡加封谥，二是对儒学倍极尊崇，三是在其家乡及全国到处建孔庙，四是对其直系后裔恩渥倍加。这四方面都可由孔子故里的一些古迹文物中具体体现出来。从孔庙大成殿内头戴冕旒，身着章服，俨然帝王之尊的孔子塑象和孔墓前“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墓碑及孔庙圣迹殿康熙亲书“万世师表”刻石中，可以看出历代帝王对孔子尊崇程度之高，从孔庙大成殿“四配”、“十二哲”的塑象和对两庑一百多名“先贤先儒”的供奉中可以看出历代王朝对儒家的推崇之甚。孔庙中的一殿一堂，一门一坊无不体现出对孔子无比尊崇之意。

遍于曲阜各地以数千计的碑刻，更是研究孔子历代地位变化的难得资料。如《孔庙置守卫百石卒史碑》中记载了汉桓帝发布的诏书上，记载依据鲁相乙瑛的请求，规定孔庙春秋两次大祭，并任命孔龢为百石卒史，专司护卫孔庙。《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中亦记载桓帝下诏准免孔子夫人亓官氏后世差徭的内容。明宪宗成化四年的《御制重修孔子庙碑》中明确刻着“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无焉。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道出孔子之道与封建统治者休戚相关的密切关系。有的碑上记“道之大原，实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圣传……圣人之功，与天比隆，圣人之祀，垂之无穷。”“圣入之道，一天道也。尊天尊圣，理原合一”都把孔子思想与天命、天道结合起来，证明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子之道进行统治乃天经地义。孔庙、孔林中有许多历代帝王祭孔的御碑，皇帝派大臣到曲阜致祭的祭文、祝文碑，历代官僚、文人到曲阜拜谒林庙的题名碑、诗文碑等，都是研究孔子思想对后世影响难得的实物

资料。

孔子强调尊尊亲亲，极力维护西周的宗法制，其后代子孙更承袭其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中尽心竭力，历代统治者也认识到优礼“圣裔”，树立一个遵依古制的样版，对自己推行封建的教化、宣扬忠君孝亲大有裨益。于是曲阜的孔子直系后裔便日益被朝廷重视。由西汉初年的“奉祀君”到唐时的“文宣公”，到宋代的世袭“衍圣公”，明清以来更官居一品，班列文官之首，成为一户“与国咸休”、“同天并老”即与封建国家休戚相关的贵族地主了。民国以来，衍圣公府（孔府）“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藏于府内数以万卷计的孔府档案，是一批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尊孔史料、经济史料和孔氏贵族地主兴衰史。孔氏族权在国内十分典型，孔府大堂上方的《统摄宗姓匾》及曲阜城里棋盘街的孔氏族长衙门，向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庙西不远的四氏学旧址使人们回忆起明清以来孔子后裔在文化上享受到的特权，孔府二门里《孔克坚与朱元璋的对话碑》更向人们揭示出孔子嫡裔与封建朝廷相互利用的原因。

总之，孔子故里曲阜一带的古迹文物是孔子研究中一批难得的珍宝，党和政府早就重视起对它们的保管和修复工作。早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首长向指战员明确交待“不准向孔庙、孔府打炮。”曲阜解放不久，即组织府内差役成立了“保护古物工会”、1949年3月1日，曲阜县人民政府公布成立了“曲阜县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1959年改为“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至今。1953年和1959年相继对曲阜的一些古迹进行了修缮。组织专家将万卷孔府档案进行了整理，发动群众与工作人员将当地的文物、古籍广泛征集，妥为保管。其间虽经十年动乱，遭到了一些破坏，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一再制止破坏

与下令保护，当地群众自发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使大量的古迹文物旧貌仍存。1970年一次修葺大成殿，政府即拨款二十万元，1978年10月至1982年，中央和省拨款一百三十万元，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投入四十万个工日，顺利完成了历史上孔庙、孔府、孔林最大的整修任务。1983年为修复十年动乱中被破坏的孔子像花了五十多万元。经过多年来不停地维修，孔子故里曲阜的主要古迹文物均得以保存，并依照原式复原陈列，以其丰富的内容再现出当年的面貌，供中外人士参观游览及孔子研究之用。

《孔子故里史迹考略》这一小小园地，将要陆续辑录一些专家、学者、历史、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孔子故里及其附近各种文物古迹方面的研究文章。它愿以当地“实”的材料，对孔子研究进行配合。在登载文章时，本着党的“双百”方针，保持作者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文责自负，促进孔子故里史迹研究的开展。当然，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尚望各地专家、学者多予指正。

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故里文物研究委员会

目 录

前言：孔子故里史迹与孔子研究·····	
·····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故里文物研究委员会（ 1 ）	
曲阜历代沿革·····	孔庆庄（ 1 ）
山东曲阜考古调查试掘简况·····	
·····高广仁 孔繁银等（ 8 ）	
孔子故里教学遗址考释·····	骆承烈（ 16 ）
曲阜古鲁城考略·····	郭克煜（ 28 ）
鲁国故城城市布局及有关遗址·····	朱承山（ 38 ）
孔庙内“响石”的声学结构·····	苏祥丰（ 47 ）
汉石人非鲁王墓卫士考·····	乐 山（ 50 ）
衍圣公与衍圣公府·····	孔祥林（ 54 ）
曲阜孔府的门神·····	张耀选 李文光（ 70 ）

曲阜历代沿革

孔 庆 庄

曲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鲁中低山丘陵与鲁西南平原的交接地带。县境东临泗水，西接兖州，北靠宁阳，南连邹县，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曲阜”一名，始见于《礼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尔雅·释地》记：“大陆曰阜。”东汉应劭注：“在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

曲阜历史悠久，境内发现许多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遗址。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而且有着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帝王世纪》载：“黄帝生于寿丘。”《史记》载：“舜作什器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续修曲阜县志》释：“寿丘在今县城东八里，即所谓旧县是也”（即今县城东旧县村）。古大庭氏、少昊氏均都于此。《左传》载：“鲁有大庭之庠”唐人孔颖达释：“大庭氏古天子之门，鲁城内有大庭氏之墟，于其上作庠。”《史记》又记：“神农氏都陈，迁于曲阜。”《帝王世纪》又载：“少昊自穷桑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云阳山。”等等，故《史记·鲁周公世家》称曲阜为“少昊之墟”。

关于曲阜的隶属，较早的记载首推《尚书·禹贡》，上记“海岱及淮惟徐州。”指此处夏属“禹贡九州”的徐州。殷商时的奄国，周时的鲁国均建都于此。《后汉书·郡国志》记“鲁有古奄国。”《阙里文献考》记：曲阜“在殷为奄”。奄是商的属国，是我国古代与中原华夏族犬牙交错的一个东方部

族。汤灭夏建国后，在黄河流域活动。《竹书纪年》记，商第十八代国王南庚时由邢（河南温县东）迁都于奄，第二十代国王盘庚又由奄迁殷（河南安阳西北），至此定居下来，开始了具有灿烂文化的晚商历史。《山东通志》卷二十《疆域志·封建》载：“奄，嬴姓，少昊之后，始祖翳，为东方夷国。”《汉书》记：“古奄国，即鲁之奄里。”《续山东考古录》载：“服虔曰：商奄鲁地。《皇览》云：奄国在鲁城内。《寰宇记》《史记》云：‘从郭出鲁奄中。张茂先云：即鲁之奄里，一曰奄中里。’因此，鲁之奄里（今县城东四里古城一带）为古奄国旧址。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灭商。周王建都镐京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政治大分封。奄为商人故地，反周势力雄厚，斗争形势复杂，位置分外重要，因此，周武王将其胞弟、王国辅臣周公旦封到这里，国号鲁。《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为周公。”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因而“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不久，武王死，成王年幼即位，周公乃“摄政当国”，不能离镐东行，遂令其长子伯禽赴鲁就国。元立《曲阜县历代沿革志碑》载：“周兴，以少昊之墟封周公伯禽为鲁侯。”乾隆版《曲阜县志》记：“今县城及廓之东南，皆鲁城故地也。”据1978年来考古钻探表明：周鲁城呈不规则的扁长方形，此城较明城大数倍，观城东南尚有部分残垣断壁，依稀可见。《太平寰宇记》记：周鲁城共“有十二门”。《周礼·考工记》载：鲁城“左坛右社，面朝后市”，是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而营建的。从考古普查探测得知：古鲁城城高墙宽，街道开阔规整，宫殿区、居民区整齐划一，制铜、冶铁、制骨、制陶等手工业门类齐全。由此可知，当时的古鲁国已相当繁华，是周代我国东部

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自公元前十一世纪鲁建国，历三十四个国君，经八百余年，至公元前249年（鲁顷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十四年）被楚所灭，地入楚，置鲁县。此即曲阜建县之始。《史记·周鲁公世家》记：“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于下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元立《曲阜县历代沿革志碑》载：“顷公二十四年为鲁所灭，乃鲁县，而地入于楚。”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负刍五年）秦灭楚，县入于秦，为秦之鲁县。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鲁县属薛郡，郡治即设在曲阜。

楚汉战争之初，“楚怀王封项籍（羽）为鲁公”（《史记》）。《曲阜县志》载：“癸巳二年（公元前208年）县入于项籍。”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冬“汉兵围项籍于垓下，籍自杀，楚地悉定。独鲁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犹闻弦诵之声。谓其守义之国，为主死节。因持籍头示之，鲁乃降，以鲁公礼葬于谷城。”①据《阙里文献考》记载：曲阜“城东北汉下村有古冢，俗呼‘霸王头’，相传葬项王首处。”当地一说城东古城村旁之大冢为霸王墓。但据考古发掘证实为汉墓，与霸王无关。

西汉建立后，继续实行秦的郡县制，此地仍名鲁县。但汉高祖为了屏卫王室，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义曾将少量同姓子侄封于各地。此地亦如此。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此地仍名鲁国，下属六县：鲁、卞、汶阳、蕃、洸、薛。至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以其地封鲁元公主子张偃为鲁王，改鲁县为鲁国。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张偃坐罪废为侯，鲁国亦随

之废除。至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又将淮阳王刘余封于此，是为鲁恭（共）王，仍号鲁国②，隶徐州（郡治在江苏），仍辖鲁、卞、汶阳、蕃、眇、薛六县，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曾毁孔子旧宅，以广其居，并破鲁壁，得古文经传，又建造了当时极为豪华的灵光殿，“周行数里，仰不见日”（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后经王莽之乱，此国亦废，而灵光殿犹存。据1978年考古发掘探测：在鲁故城的西南部发现汉鲁城故址。城呈长方形，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2.5公里，周长8.4公里，已发现五个城门。汉城西、南墙与周鲁城的西南墙相合，而东、北则另筑新墙，墙宽约10米，现地上已无遗迹。

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将此地改属豫州刺史都鲁国，县为国都。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将废太子刘强封为东海国王，令其利用灵光殿之遗存，仍都于鲁。

魏晋时期，东海国废，复鲁县，属豫州鲁郡，鲁县为郡治。《曲阜县志》卷十九《通编》载：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废东海王芳为崇德侯，国除，县入于魏。”“黄初二年，置鲁郡。”郡“领县六：鲁、邹、蕃、薛、卞、汶阳”③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冬十二月晋代魏，县入于晋。“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复以鲁县为鲁郡治，仍隶豫州部”④

南北朝时，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代晋，徙鲁郡治，鲁县改隶兖州郡。北魏时，“丁未魏献文帝皇兴元年（公元467年）春正月，遣兵进取（刘）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仍以鲁县为鲁郡治，隶兖州。”⑤“北齐文宣帝天宝元年（公元550年）齐代东魏，改鲁郡为任城郡，（鲁）县属之。”至“丁酉